

第一篇

学校的建立与发展 轨迹

校史是一所学校创立、发展的历史轨迹，是一所学校继往开来的精神基石，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四川师范大学诞生于战火纷飞年代，成长于百废待兴之时，发展于改革开放之际，与国同运，与时俱进，继承东北大学“自强不息，知行合一”的校训，形成了“艰苦奋斗、兢兢业业、甘作红烛、追求卓越的优秀品质，以及‘重德、博学、务实、尚美’的精神”^[1]。它既经历了曲折和磨难，也经历了奋进和跨越，具有悠久的办学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学校“历来十分重视对大学精神的培育，与时俱进、传承鼎新，努力建设具有师大特点和时代特色的大学精神”^[2]。梳理学校建立与发展的轨迹，可以使学校师生明晰学校发展的历史脉络，更好地领会七十年来办学形成的师大文化，体会学校发展成果的来之不易，汇聚师生开拓进取的精神动力，为把学校建设成国内一流的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和特色鲜明的教学研究型大学贡献力量。

[1] 张韦韦，三江：《周介铭：书写“精神”的学者》，《教育与职业》，2007年第31期，第60页。

[2] 周介铭：《大学精神的培育》，《四川日报》，2006年10月31日。

第一节 烽火岁月 植根基层

川北农工学院时期(1946—1949年)

大学文化并非与生俱来,或是不断传承得来的,它是学校师生在校史沿革中共同构建和广泛认同的基础上逐渐积累形成的,蕴含着独特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气质。“大学的特殊性质进一步决定了该组织所具有的精神气质。大学精神作为对大学高层次文化价值追求的凝练,是历史传统与当代精神的有机统一。”^[1]一个学校的起源,往往对其今后的发展建设影响重大。在校史沿革中,四川师范大学的诞生与东北大学有着直接的历史渊源。无论是办学基础,还是大学精神,东北大学都对四川师范大学的校史文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20世纪初的中国,内忧外患,列强觊觎东北。为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兴办大学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1923年4月26日,东北大学在沈阳成立,以“知行合一”为校训,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为宗旨,奉天省省长王永江为首任校长。1928年,张学良继任东北大学校长,不惜重金聘请知名学者来校任教,并捐出家产百万元建筑两个教学楼(汉卿南楼、汉卿北楼),^[2]使东北大学蓬勃发展,以“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进国家现代化,而消弭邻邦野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沈阳沦陷,日本南满公学学堂长伪致慰问,劝其照常上课,称经费由日本供给。^[3]全校师生悲愤至极,严词拒绝,于是,东北大学成为国内第一所流亡大学,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艰苦办学历程。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软禁在南京,东北大学于1937年由臧启芳接管,改为国立东北大学,并

[1] 吴运亮,郭潇雅:《大学精神:高校内涵式发展的关键》,《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4日。

[2] 李成良主编:《四川师范大学校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3] 杨佩桢等主编:《东北大学八十年》,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先后设校于开封、西安。不久，日寇空袭西安，东北大学被迫再度踏上流亡之路，由陕入川，于1938年3月迁至四川三台县，“当地政府和各界群众召开了有3000人参加的欢迎大会”。^[1]

东北大学在三台县先后借得三台试院、草堂寺（杜甫避徐知道之乱寓居之所）、城东杜甫草堂（即田颂尧二十九军军部旧址）、三台高中部分校舍等多处地方，在艰难的条件下勉强复课。此后，东北大学在草堂寺中新建了图书馆、餐厅，并在校园内增建了教室、宿舍，于北郊建化学实验楼，于城西外马家桥建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于奎星阁开辟“杜公纪念堂”，又租赁校本部北隅为体育场，购买蚕丝公司志愿训练班房屋作为新生院。东北大学教学设施的基本完备，使师生的教学科研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

痛失家园、颠沛流离的东北大学，从院系建设、课程设置、科研方向等方面紧紧结合坚持抗战和大后方开发的实际需要，加强工、农等实科的教学与科研，注重培养应用型人才，重点考察与研究当地和边疆区域的重大经济、政治、民族与社会问题，成效显著。在三台县办学之初，东北大学只有文学院、法学院，之后陆续扩充为文、法、理、商四个学院，增设了外文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工商管理系、法律系等，学生人数达到700多人，有教授、讲师和助教80余人，成为一所完整的大学。一批名师如陆侃如、冯沅君、金毓黻、高亨、杨荣国、姚雪垠等齐集三台，不少课程均由知名教授主讲，如姜亮夫（1902—1995年）、潘重规（1908—2003年）、蒋天枢（1902—1988年）等知名教授在三台县为各系大学一年级主讲国文课；川内知名人士、川籍学者李季伟任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2]可谓学术氛围浓郁。东大学生还举行义演，捐赠前线，支援抗战。东北大学编印的学术刊物《东北集刊》《志林》收录了师生数百万字的论文，研究课题广泛，从“大学精神”到“儒家政治思想的发展”，从“三台物价”到“东北人口发展的特点”，调查缜密，论证严谨，实用性强，令人叹服。

[1] 魏向前，孙雷，张国臣主编：《东大逸事》，东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2] 四川师范大学档案馆：《抗战时期内迁三台的东北大学》，《四川师大报》，2014年2月13日第558期。

东北大学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除在“七·七”“九·一八”“双十”等特别纪念日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外，还利用业余时间到街头、茶馆等公共场所开展演讲活动。广大青年学生根据自己的亲身遭遇和所见所闻强烈地控诉日寇在沦陷区烧杀淫掠的残忍罪行，场面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文学院学生还常在广东馆、华光庙上演《凤凰城》等抗日戏剧。一些进步同学还深入到周边农村和三台各校宣传党的全面抗战方针。一些有志青年如三台潼属联合县立高级中学（简称潼高中）学生于思齐、段先玉、谭笑天等八人先后奔赴延安，踏上革命之路。这些宣传活动促进了地方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东北大学努力协助地方开展社会教育，设立了社会推进委员会，先后在城区办有学术讲座、职业补习教育、民众识字教育、合作指导、民众法律顾问、地方自治指导、防空防毒知识技能传习、公共卫生指导及各种展览会等业余教育，^[1]深受民众欢迎。东北大学还组织学生调查研究三台县的市场物价，刊印了《三台物价特刊》，真实反映了抗战期间物价飞涨和三台人民的生活状况，为人们正确认识社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东北大学积极倡导体育运动。东北大学在三台校本部北隅租佃农田修建了一个400米跑道的标准田径场，为城区各中学生和市民提供了运动场所。东北大学每逢举行各类比赛和运动会，不仅吸引了大量中小学生和群众前来参观，还带动了地方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1942年5月，东北大学举办了第一届川北联合运动会，川北各县数十个大、中学校前来参加。历时三天，观众达七八万人次，这是川北体育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运动会，^[2]对地方体育运动的发展影响重大。1943年2月，东北大学为庆祝建校二十周年校庆，主办了第二届川北联合运动会，还邀请了成、渝两地的各大学代表队参加比赛，其规模大大超过了第一届运动会。这些运动会的举行，有力地促进了川北地方体育事业的发展。

[1] 唐宏毅主编：《东北大学在三台》，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2] 唐宏毅主编：《东北大学在三台》，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4页。

东北大学积极传播进步文化。1945年2月,东北大学文学院一批进步教授以文学研究会、实验剧团、合唱团三个组织的成员为基础,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三台分会”,此后又扩大为川北文协分会。由东北大学进步学生组成的三台实验剧团,用戏剧的形式向人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先后演出了《北京人》《日出》《家》《祖国在召唤》《喜剧春秋》《雾重庆》等剧目,轰动三台城乡,深受群众欢迎,观众争先恐后观看,络绎不绝,丰富了地方人民的文化生活,宣传教育成果显著,大部分收入也用于捐献前线。

东北大学为地方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方便蜀中学子就学,在地方人士和四川大学蒙文通教授的支持和襄助下,1943年秋,东北大学教授丁山、高亨、孔德创建了“草堂书院”,后改为“三台草堂国学专科学校”,由赵纪彬、陆侃如、丁山、冯沅君、姚雪垠、董每戡、杨向奎、杨荣国、叶丁易、孙道升、陈述等教授和名师担任教学工作,为地方培养了一大批人才。1945年秋,东北大学教授赵纪彬等在盐亭安家场创建了“为公初级中学”,继承和发扬抗大精神,传播马列主义,造就了一批革命人才,在盐亭产生了广泛影响。不少东北大学的教授、教师在三台潼高中、县初中、女中等学校兼课、代课,各教授的学术论著在三台城区广为发行,对地方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东北大学在三台的8年时光里,尽管“办公、学生补助、学术研究等费,极感支细”,校舍简陋,物资匮乏,土木老屋,糙米黑面,桐油照明,无车无舆,生计危及。^[1]但东北大学师生直面困苦,再续弦歌,追求学术发展,传播进步文化,开展社会教育,倡导体育运动,办学成绩甚佳,“各级中学林立”,使得川北“学风丕变,蔚极一时之盛”,为川北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地方政治、思想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正是东北大学对推进川北地区经济社会特别是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抗战胜利后,东北大学迁返沈阳,川北各地怅然若失,于是,“唯有继东北大学而兴办单独学院,乃能得相当之解决”。私立川北农工学院的创建,也就成了历史的

[1] 四川师范大学档案馆:《抗战时期内迁三台的东北大学》,《四川师大报》,2014年2月13日第558期。



图 1-1-1 内迁三台的国立东北大学校门

图 1-1-2 国立东北大学三台校址平面

必然，这就揭开了四川师范大学办学的历史篇章。可见，东北大学成为“四川师大校史最基本、最悠久的历史渊源”^[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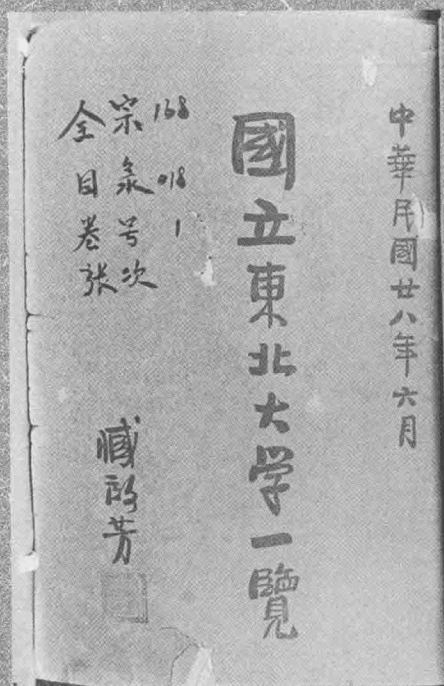
当时，东北大学师生即将迁回沈阳，川北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势头或因此中断。而所遗三台校舍和校具，可供千余师生员工之用，废弃实为可惜。针对这种情况，时任四川省参议会参议员、东北大学理工学院院长川籍教授李季伟在《国立东北大学迁移后三台高等教育当如何调整刍议》一文中提出：“唯有继东北大学而兴办单独学院，乃能得相当问题之解决。”该文在《川北日报》上发表，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注，称：“乘东北大学迁移后，就其原有设备，因地制宜，改设川北农工学院，以期造就经济建设所需之高级技术人才，以图川北农工生产事业现代化。”^[2]私立川北农工学院的设立人程厚之曾说：“前东北大学复员之后，利用其基础，创办一个为川北所用、为川北所享的农工学院，我们有了一个造就实用科学人才的学府。”^[3]当时东北大学留下的财力、人力基础主要有：东北大学遗留校具、图书仪器；东北大学在三台县的校址；原任教或就读东北大学的川籍及其他省籍师生（迁走的学生占 1/3，留下的学生占 2/3）中不愿迁东北者。

1945 年 12 月，在四川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上，李季伟联合罗忠恕等 12 名参议员提出的《为请设立川北农工学校于三台以应需要而宏造就案》的提案获得通过，由四川省参议会函请省政府“查照办理”。之后不久，在三台县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上，参议员谭卫根等提议据此创办一所大学，大会决议——“由三台县参议会发起筹备川北农工学院，并将李季伟先生所草《国立东北大学迁移后三台高等教育当如何调整刍议》一文”及《为请设立川北农工学校于三台以应需要而宏造就案》的提案“汇印函送各县及省内外有关方面征

[1] 李成良主编：《四川师范大学校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 页。

[2] 李成良主编：《四川师范大学校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75 页。

[3] 李成良主编：《四川师范大学校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5 页。



↑ 图 1-1-3 东北大学校舍、图书馆

↓ 图 1-1-4 臧启芳校长题写的东北大学三台办学概况的档案卷宗

求意见”，^[1]先后得到了王定伯教授、川籍教授兰蔚丰、东北籍留校工作的翟向山，以及三台县等川北地方各界有识人士的广泛支持。

1946年4月15日，四川省第12行政专员督察区（辖遂宁、三台、盐亭、中江、蓬溪、安岳、乐至、射洪、潼南9县）召开“教育视导会议”，会议决议以70多名代表为发起人，推举各县县长、参议长及教育会理事长为筹备委员，成立川北农工学院“筹备委员会”，并公推第12区专员程厚之负责主持筹备工作。1946年5月4日，程厚之召集川北各县地方士绅数十人，召开筹备川北农工学院座谈会。会议公推程厚之为筹备会主任，三台县县长李劲夫、三台县参议长龙杰三为副主任，成立总务组（谭卫根、何良汉负责）、宣传组（龙致宁、邱楚楠负责）、设计委员会（李季伟、王隶之负责）、基金筹备委员会（霍新吾、刘颢侯、赵伯光负责），并聘李季伟为院长。“筹备会于5月16日开始办公，遂以是日为学院的校庆纪念日。”^[2]由于私立川北大学及其后的川北大学的关防、学生的学籍、各种档案等历史文件等，均完整地保留在现今四川师范大学，该校许多教师也长期在四川师范学院（大学）任教，私立川北农工学院及其后的川北大学也就成为四川师范大学的主体渊源。私立川北农工学院的建校日——1946年5月16日，也就成为四川师大建校的起始时间，即校庆日。

私立川北农工学院从建立开始，就遇到了重重困难，最大的问题就是经费不足。由于私立川北农工学院属于地方自建，不属于中央政府拨款范围，只能靠社会募捐，地方自筹，主要来源以九县征粮和川北盐场盐税为主。加之当时物价飞涨，法币贬值，学院只能以粮食等实物来作抵押，“从县参议会借了大概几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几万元）作为筹建的启动资金”。^[3]教职员工经常不能按时拿到工资，几乎不能维持正常生活。教职员工相当缺乏，许多老师经常加班加点，一人承担多人工作。可以说，尽管有东北大学留下的办学基础，也有

[1] 高林远主编：《风雨六十年——四川师范大学简史》，2006年编定（内部资料），第6页。

[2] 李成良主编：《四川师范大学校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3] 李成良主编：《师大旧事》，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页。

地方各界人士的广泛支持，但川北农工学院的发展依然步履维艰。

1946年6月13日，筹备会主任程厚之，副主任龙杰三、李劲夫，院长李季伟，委员谭卫根等到成都参加四川省参议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期间，邀请省政府各厅处长、各机关、各校校长、川北及周边各县的省参议员、各报社等舆论媒体，介绍川北农工学院的筹备情况。这次大会随后通过了关于川北农工学院的三件提案：一是请省政府将原潼属联合县立高中校产全部拨给川北农工学院；二是请省政府将三台县刘营乡备而未用的飞机场拨给川北农工学院，作为实验农场或经济农场之用；三是请省政府在预算中加列川北农工学院补助费。

经教育部留渝办事处及四川省教育厅的同意，1946年8月中旬，川北农工学院在成、渝和三台招考，报考生源省份除四川省外，还有西康、湖南、湖北、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云南、贵州、广西、辽宁、吉林19个省份。

1946年9月20日，筹备会在三台县召开“设立人会议”。会议通过了《董事会章程》，成立了董事会，推举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委员徐堪为董事长，专员程厚之（1947年辞职离川，继任李泽民接替）为代理董事长，李劲夫（1948年离任，继任县长徐均良替代）、龙杰三、李季伟为常务董事。董事会正式聘请李季伟为院长。会议决定成立“基金保管委员会”等多个委员会，负责基金的保管。会议还决定由各县按粮税附加，募集黄谷5万石（每石合150市斤），各盐场的盐税每百斤附加2角，筹集现金2亿元，用作办学经费。

为了能够争取到更好的办学条件，1947年暮春，李季伟院长受董事会委托，前往南京教育部申请立案，董事长、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徐堪从中游说。但陈立夫（原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认为“工农联合”是共产党的口号，而不是国民党的政策，拒绝予以立案。然而194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编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记载：“私立川北农学院，校址：四川三台，院长：周建侯。”^[1]这实际

[1] 杜心华主编：《四川师范大学校史》，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上是对学院默认。

东北大学“培养实用科学人才”的教风、学风也在李季伟等一批师生的努力下得以继承与发扬。^[1]正如李季伟所言：“国立东北大学因复员而迁移后，三台高等教育应当继之而兴办‘私立川北农工学院’，是不仅川北一隅之幸，亦全国之幸也。”^[2]在科系设置上，私立川北农工学院在原有工商管理系、化学工程系、土木工程系、农业经济系、农业园艺系5系和1个先修班的基础上，增设农田水利系、数理系，从而使学院达到了7个学系。

“大学精神是在大学发展过程中逐步积淀下来的内在气质，……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它外化为学校的校风学风、师德师风。”^[3]由于私立川北农工学院沿用东北大学的校址、校具进行办学，东北大学部分师生也留校任教，参与川北农工学院的筹建和发展。因此，东北大学的办学宗旨、校风校训，对私立川北农工学院影响甚大，也成为四川师大精神的直接渊源。国立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曾为私立川北农工学院题词“励志笃行”。尽管私立川北农工学院办学条件十分艰苦，房屋破旧，校具简陋，但教师勤奋，学生刻苦，“都能体谅创业之艰辛”，^[4]学生“入学后愿遵守学校一切章程及临时校令，专心循序修业在校外愿束身自爱，誓不玷辱校名”^[5]。学生学习兴趣浓厚，态度认真，情绪饱满，毅力顽强。值得一提的是新生中的胡大鹏是共产党员，在中共川北工委的领导下，先后发展党员20余人。1949年5月9日，经川北工委批准，正式建立中共川北农工学院特别支部委员会，胡大鹏任书记，组织委员为代聪，宣传委员为胡必达，青年委员为彭先诚。他们在同学中传播革命思想，领导革命活动，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三台县的除旧布新，功效显著。经过连续三年招生，私立川北农工学院共

[1] 李成良主编：《四川师范大学校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2] 李成良主编：《四川师范大学校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3] 周介铭：《在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研究高层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2014年3月22日。

[4] 余正松，王治权主编：《四川师范学院院史（1946—1996）》，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5] 四川师范大学档案馆：《艰难办学的川北农工学院》，《四川师大报》，2014年2月28日第559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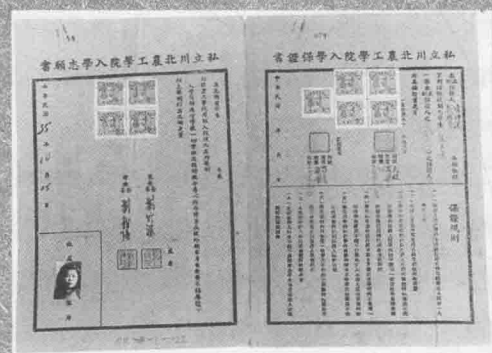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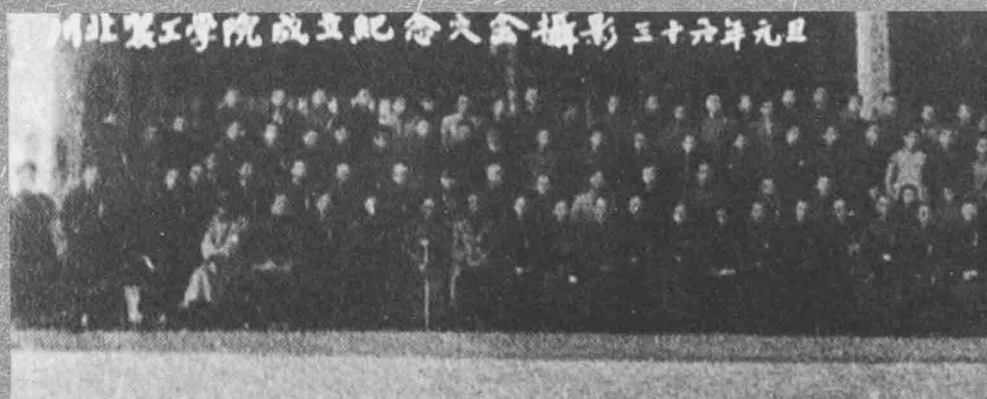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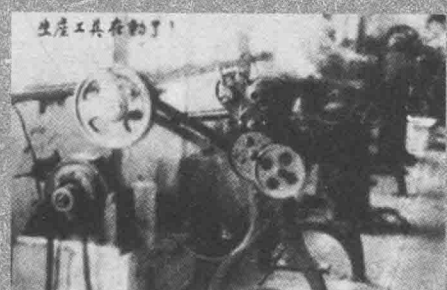


图 1-1-5 1947 年 1 月，私立川北农工学院召开成立纪念大会

图 1-1-6 私立川北农工学院学生的入学保证书和家长签名的入学志愿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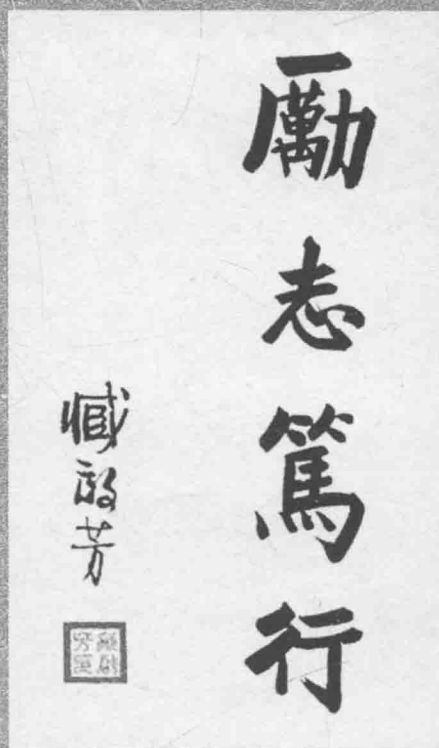
图 1-1-7 川康绥靖总署同意私立川北农工学院启用公章复函



↑ 图 1-1-8 私立川北农工学院的教学场景（地理勘察课）

⇐ 图 1-1-9 私立川北农工学院的教学场景（耕犁机）

⇒ 图 1-1-10 私立川北农工学院的教学场景（农具）



个 图 1-1-11 私立川北农工学院的教学场景（化学实验课）
 左 图 1-1-12 私立川北农工学院学生的准考证、学生证
 右 图 1-1-13 国立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为私立川北农工学院题词

有三个年级的学生 850 人，教职工 98 人。教职工中，教授 16 人、副教授 10 人、讲师 8 人、助教 15 人、专任教员 15 人、职员 10 人、工友 24 人。^[1] 私立川北农工学院成为约有师生一千人的高等学校。

私立川北农工学院的成立顺应了川北高等教育的发展要求，赢得了社会舆论的好评，《大公报》《涪江日报》多次报道了私立川北农工学院的办学情况。可见，私立川北农工学院已经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关注，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第二节 筚路蓝缕 艰苦创业

川北大学时期（1949—1951 年）

“学院改大”这个提法在当时是个特定词语，指由学院改为大学。私立川北农工学院成立后，招生规模不断扩大。董事会和川北各界有识之士为了适应川北高等教育的发展，争取更好的办学条件，培养更多的建设人才，申请改为大学。1948 年 11 月 1 日，私立川北农工学院召开第五次董事会扩大会议，专门商讨申请“改大”的名称、办学经费的筹集、学系的扩大等有关问题。会议成立了“私立川北大学”董事会，共同推举私立川北农工学院董事长徐堪为私立川北大学的董事长，三台县参议长龙杰三为代理董事长；1949 年暑期招生使用“私立川北大学”名义。会议决定，学校的办学经费暂定为黄谷 12 万石，由川北 4 个行政专员督察区（第 11、12、13、14 专区）、川北盐务管理局所属盐场共

[1] 杜心华主编：《四川师范大学校史》，成都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 页。